

博雅文丛

朱熹文学思想研究

李士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博雅文丛



博雅文丛

朱熹文学思想研究

李士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李士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博雅文丛)

ISBN 978-7-02-010084-2

I. ①朱… II. ①李… III. ①朱熹(1130 ~ 1200)—文学思想—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7592 号

责任编辑 葛云波

装帧设计 赵迪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8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 插页 2

版 次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084-2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一

士金同志三十年来专心研究学问,我作为他的研究生导师是很清楚的。他在1981年大学毕业后就写信向我求教,还把自己阅读古代小说所摘录的点滴资料写信给我。1984年9月正式在我名下读硕士研究生,研究中国小说史。1985年,我们一起到镇江参加《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他把研究《红楼梦》创作成功要素的论文给我看,希望作为毕业论文,我细细阅读之后,觉得选题很有价值,我告诉他,你的文章风格,有点像王国维,但是这个选题难度很大,有些资料尚有争议,所以,我建议另选稳妥课题。后来他选择《老残游记》研究作为毕业论文,写得很有才情、很有深度。

在三年读书期间,我和1984级的两个研究生陈桂声、李士金合作编撰《文史工具书手册》,1989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后我和士金同志书信不断,我知道他人生中挫折不少。1997年士金同志到复旦读博士研究生,在王运熙先生指导下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并在上海安家,我感到很欣慰。他也总是不断地向我汇报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我记得他当时出版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其中包括了博士学位论文《朱熹文学思想述论》。他请我写了一个序。2009年,士金同志与他的妻子、

女儿一起到天津看我,我非常高兴啊!他告诉我,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原创性虽强,但对于原材料的理论分析比较薄弱,所以在毕业后不断加以深入研讨,又发现了不少新材料,发表了很多篇论文,现在准备把新的研究成果出版,书名《朱熹文学思想研究》,请我写序。

翻阅《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书稿后,我觉得士金所做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多是自己的创获,自己的体会。他的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对于朱子本人思想的理解和挖掘,能够心领神会,所以对于朱熹文学思想中的忧国忧民情怀特别关注,讨论深透,淋漓尽致。这与士金本人关注社会民生的热情有密切的关联。他对于朱熹原著很熟悉,又阅读了许多的历史背景资料,所以他对朱熹本人的生平行事是很理解的,正因此,他对朱子的为人十分向往推崇,对朱子的文学思想评价之高,在辛亥革命后,实属罕见。他对朱熹文学思想,理解到位,独辟蹊径,见解深刻,意味深长,可谓文公知音。

朱一玄

2009年8月

序二

李士金同志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是在博士学位论文《朱熹文学思想述论》的基础上,不断深入进行理论研究而成。这个过程经历了大约十年时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在2000年下半年就出版了。毕业论文答辩过程中,许多专家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作为指导老师,我对他的论文写作要求很严格,请杨明教授具体把关,总体印象是原创性强,创见颇多,对于前贤理解程度深刻。但也有不甚满意的地方。比如,对于学术界现有成果的借鉴不够,对于原始资料的理论分析欠缺。令我高兴的是,在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士金同志继续深入细致研究朱熹文学思想,获得了更多的成就。他住在上海,离我的住地不远,所以经常来与我讨论学术问题,他把多年来学界研究朱子文学思想的二百多篇论文搜集起来,集中阅读考察,发现了许多问题。他说,只有莫砺锋等极少数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专家的文章没有引文错误,其他的许多作者,不要说真正理解朱熹文学思想,即使引用朱熹的原著也错误百出。他还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这方面的批评文章。我觉得现在的学术批评太少了,不利于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士金同志作为我的学生,在博士论文中批评过我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有关朱熹文学批评研究中关于“天生成腔子”的内容,杨明同志在具

体指导的时候不但没有表示异议,而且加以鼓励和欣赏。学术要求公论,这也是朱熹本人一贯的理学原则。所以士金同志请我为他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写序,我很高兴。

我觉得他的这本专著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既能借鉴已有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成果,又能不受学界已有成果的局限,从原著文本出发,吃透原著内涵,知人论世,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比如,朱熹的诗经学研究,作者能够深入到朱熹的思想心灵深处,发现朱子本人诗经学所体现的文学思想与其理学情怀忧国忧民精神的一致性;在朱子的楚辞学研究中,作者能够把屈原与朱熹本人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自然地联系起来研讨,凸显作为理学大家朱熹的超越世俗的文学思想境界,这些在前人研究中是罕见的,值得重视。朱熹的文学思想言论比较零散,许多文学思想内容未被学界重视,比如朱熹的创作学思想,在本书中有专门的一章,加以深入探析,这在朱熹文学研究史中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朱熹对于历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学界有比较多的成果,但本书作者的研究更具有系统性,更全面,更细致,新见不少。有关朱熹文学理论的研究,在本书中也很全面深刻,有的纠正了前人的误解。比如“天生成腔子”这个术语,以前学界不太重视,几本重要的文学批评史著述对于这个重要的理论概念亦有误解误读,本书作者根据原著文本,融会贯通地加以阐释,比较符合朱熹文学思想的原意。总之,本书与《朱熹文学思想述论》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和进步,对于朱熹文学思想的研究更全面,更周密,更细致,更深入,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专著,故很高兴说几句话作为序言。

王运熙

2010年9月写于上海家中

前 言

朱熹(1130—1200)在中国理学思想史上之地位人多知之,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则未有定论;人知其为理学大师而难解其天理精微、遗传气禀之学,人鲜知其为文学名家而栖息于半亩方塘、源头活水之间,幸与不幸,言难尽意。欲理解其文学思想,必先理解其为人品性,欲理解其为人品性必观其言动思虑。朱熹辞官文字之多,实千古未有,其淡泊荣华,乐在陋巷,与孔颜同风;一旦作官则忧国忧民,奋不顾身,鞠躬尽瘁,德昭天下。其上书孝宗皇帝:“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以至于“上读之,大怒曰:‘是以我为亡也。’”^①其言直道而无忌,胸中浩然之气,自然流出,为国家民族大局忧深思远,精神丰碑,历史铭刻。

我1997年作博士学位论文即研究朱熹文学思想,著有《朱熹文学思想述论》。恩师王运熙、杨明悉心指教,略有所成。人世匆匆,碌碌无为,资料繁富,草创粗略,无有理论体系。钱穆

^①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列传一百八十八《朱熹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967页。

谓：“朱子乃吾国学术史上中古唯一伟人”，“私所向慕，时加赞叹”。^① 读钱氏书，理解愈深，故十多年潜心研究而有《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之作。

本书研究分为六章，即《诗经》学研究，《楚辞》学研究，论历代作家作品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研究，广义创作论研究，文学理论专题研究。《诗》学和《楚辞》学则探析义理，直达本源，研讨艺术，探赜索隐，具体社会政治、婚姻风俗、天文地理等等无穷意蕴如溪之流，潺湲而出。论历代作家作品研究则探析本意，辩证分析，知人论世，以求真相。文学批评论和文学欣赏论则客观全面，比较审美，突出根本之义理核心，考证文学，细入毫芒，思艺并重，体系井然。广义创作论研究则揭示朱熹有感而发凸显时代精神，研析学习模仿及态度方法，重视创作修养原则，论述创作主体复杂，乃至生活体验、创作灵感等均细加研讨，使朱熹零散评论，有机一体，创作理论清晰可见。文学理论专题研究则文道精微，真蕴显示；文体邃密，形神具备；自然平淡，大义不同；巧极微妙，返璞归真；文气纷繁，贵在适中，丰富多元，和谐为则；天生成腔子，乃天然风韵总体风格，直探大贤本意。凡此种种，实为朱熹文学研究领域前所未有的，或可弥补空白，有助后学。学界成果多所引证，时加辨析，不敢唐突前辈，唯真实真理是求。

南开导师朱一玄、复旦导师王运熙耄耋之年亲为作序，栽培之恩，永志难忘。师兄刘国辉多方指教，责编葛云波悉心指导，令我感激，时刻在心。本书虽经多年，学识所限，疏漏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本人不胜感谢之至。

①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例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目 录

序一.....	朱一玄	1
序二.....	王运熙	3
前言.....		1
第一章 朱熹《诗经》学研究		1
一、朱熹揭示《诗经》作为经典的文学性特征		2
二、朱熹《诗经》研究思想和艺术兼顾的特点		11
三、朱熹《诗集传》具体篇章之思想和艺术分析		25
第二章 朱熹楚辞学研究		61
一、朱熹楚辞研究概论.....		61
二、朱熹楚辞研究理论原著分析.....		65
三、朱熹《楚辞集注》具体篇目思想内容分析		71
第三章 朱熹论历代作家作品研究.....		106
一、朱熹讨论唐代以前作家作品分析		107

二、朱熹论唐代作家作品	119
三、朱熹论宋代作家作品	135
 第四章 朱熹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研究	171
一、朱熹研究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	173
二、全面客观地理解作家作品	176
三、朱熹理解文学具体分析	180
四、朱熹比较文学批评研究	187
五、朱熹文学批评中的文学考证研究	199
六、朱熹文学批评文学欣赏思想与艺术并重研究	204
 第五章 朱熹广义创作论研究	230
一、朱熹创作学思想概述	231
二、朱熹批评文章文学写作形式主义之时代潮流	234
三、朱熹论文学创作的学习与模仿	238
四、朱熹论创作之态度和方法	253
五、朱熹论创作之“根本工夫”	264
六、朱熹论创作主体之复杂性	271
七、朱熹论生活体验与创作灵感	275
 第六章 朱熹文学理论专题研究	282
一、朱熹文学思想的大纲——文道关系论	282
二、朱熹的文体学说研究	296
三、朱熹论“平淡”、“自然”和“巧”	308
四、朱熹文气论研究	318
五、朱熹“天生成腔子”深刻意蕴探析	330

附录 朱熹文学研究百年一瞥.....	349
主要参考文献.....	367

第一章 朱熹《诗经》学研究

朱熹研究《诗经》著有《诗集传》，后世褒贬不一。近人赞扬最力而直白者当推郑振铎，谓朱熹“打倒了《毛诗序》，……发见郑、卫诸风中情诗的真价，……这是很痛快的一个真实的大批评家的见解！”^①张健则谓“朱熹对于诗经，虽有心重新予以解释和估量，却并没有整套严格把持的法则，有些见解，仍可说是出自心血来潮”^②。束景南在《朱子大传》中有较深切之论述，如谈朱熹的诗学历程；^③朱熹诗学的自我否定；^④谈朱熹批评吕东莱《诗纪》；^⑤论朱熹的淫诗说，并推倒《毛序》，建立新的《诗》学解经体系；^⑥甚至认为“《诗集传》宣告了一代新的解经体系与解经方法的诞生”^⑦。等等，值得注意。吴长庚著《朱熹文学思想论》有三章涉及，分别是第一章“朱熹的文学生涯”第三节“朱熹的文

① 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新1版，第612页。

② 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51页。

③ 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304页。

④ 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351页。

⑤ 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1页。

⑥ 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391页。

⑦ 束景南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50—756页。

学研究——三大著述”^①；第七章“朱熹诗学思想论”^②；第九章“朱熹解易解诗思维论”^③。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有一章专门加以论述，即第五章“朱熹的诗经学”^④。拙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有两章讨论朱熹之诗经学，分见第二部的第一章“朱熹的《诗经》研究”。^⑤和第二章“关于《诗集传》的具体内容”。^⑥有关朱熹诗经学研究论文，几十年来数量最多，占全部朱熹文学研究论文近三分之一。其中争议最多的是所谓“淫诗”说，直到2012年仍然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⑦从总体上看，各家研究朱熹诗经学都充分肯定了他诗经学研究的创新精神和巨大成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有不同意见，比如对于朱熹“淫诗”说的认识，关于朱熹究竟如何看待“诗序”等问题，尚有争论。我认为钱穆所论最得朱熹诗学深微之意：“能直抉经旨，使人真能睹见古圣贤传统，而还以发明宋代理学新兴之大义，求之当时，舍朱子殆无人。”本书朱熹诗经学研究继承钱穆之意，对于《诗经》具体思想意蕴与艺术方式，详加探索。

一、朱熹揭示《诗经》作为经典的文学性特征

《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历来众所周知，但是它作为经典文学

① 吴长庚著《朱熹文学思想论》，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8—28页。

② 吴长庚著《朱熹文学思想论》，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60—298页。

③ 吴长庚著《朱熹文学思想论》，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23—341页。

④ 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262页。

⑤ 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78—108页。

⑥ 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144页。

⑦ 徐正英、陈昭颖：《“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中州学刊》2012年第4期。

的意义则很少被明确地揭示,朱熹继承前人成果,在揭示《诗经》的文学性特征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当然,朱熹并没有在语言上直接说“文学性特征”之类的话,我们是从他讨论和注释《诗经》的具体言论中发现客观上或者说事实上他确实揭示出了这部儒家经典的文学性特征。

朱熹在评价《吕氏家塾读诗记》一书时对《诗经》研究作过这样的概括:诗自从齐鲁韩氏之说不得传,天下之学就尽宗毛氏。推衍阐释的人又独郑氏之笺而已。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讹踵陋,百千万言不能超出他们两家的区域范围。至于本朝刘侍读、欧阳公、王丞相、苏黄门、河南程氏、横渠张氏,开始发挥自己的意见有所发明。虽然他们各有浅深得失,也有不恰当的地方,但自此以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终于可得而寻,学者也知道诗说不专于毛郑。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求者益众,说者愈多,同异纷纭,争立门户,不再有推让祖述之意,使学者也无所适从。^①朱熹在这里对《诗经》研究历史作一宏观扼要的概括,虽未必完全准确,但确实表达了朱熹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冲破毛郑诗学束缚的强烈意愿。

朱熹研究《诗经》对前人成果把握深透,朱东润对《诗集传》之前宋代《诗经》研究成果专列“自《诗本义》至《诗集传》”一节有较详论述,可供参考^②。朱熹揭示《诗经》的文学性特征,最突出地表现在推倒了小序的一些偏见,破除了美刺的机械模式。这在古代文学思想和艺术研究的历史上,意义深远。他非常

① 朱熹著《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4—3655页。

② 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181页。

感慨地说,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没有什么两样,其间自然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因为序者之例,篇篇要作美刺诗,将诗人的意思穿凿坏了。《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并非古人创作的原意。古人之诗虽存,但意思不清楚,所以序诗的人妄诞其说,便怀疑既然其人如此,诗之美刺即是此人。如庄姜之诗,却以为是刺卫顷公,顷公固然是卫国一不美之君,序诗的人只因见诗中刺不美之人,便以为这诗是刺顷公。此种情况很多,都是妄生美刺,初无其实,^①朱熹提出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没有什么两样,深刻认识到文学创作的历史过程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性,文艺本身“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审美特征朱熹看得很清楚。诗有讽刺的力量,但更多的是在典型的意义上形成的社会性讽刺,并不一概是讥讽某个具体的真实的人。当然,朱熹并非全部否定《小序》之价值,对此莫砺锋有详细论述,认为朱熹既知《小序》之非,“亦不讳其是”,此乃“朱熹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的体现”^②。

朱熹在检讨自己解诗的过程中发现一味地相信《序》说,肯定会束缚诗意。他具体回忆这一过程说,曾经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到解不通处,也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释诗意,虽然保存《小序》,偶尔也批评《小序》的不合情理,但终于还是见不出诗人本意;后来发现只要尽去《小序》便可解通,于是尽涤荡旧说,诗意方活。要注意一点,朱熹在这里的措辞有绝对化的倾向,也容易引起人们误解。如“尽

① 《朱子语类》卷八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8—2749页。

② 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去《小序》”，“尽涤旧说，《诗》意方活”。他重点是强调《小序》的机械拘泥说诗方法不好，并不意味着《小序》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在《诗集传》中，《小序》可取之处已经为朱熹所接受就是证明，朱熹用语有时会“失误”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在研究分析时必须注意这一现象，以免引起误会和争论。钱穆评朱熹“博综汉儒，以训诂考据发得《诗》之真相，《雅》《郑》邪正，剖辨昭晰，如朱子《诗集传》之所为，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①。所谓真相其一即是揭示《诗经》之文学性特征。

在能否认识《诗经》文学性特征这个问题上，朱熹与他的好朋友吕祖谦有明显的差异和矛盾，他并不回避这一问题。他说，东莱《诗纪》，编得够仔细，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说甚么！朱熹本人与学生的对话生动地体现了二者对《诗经》文学性认识之差异：我曾经与他讨论《诗》，如《清人》、《载驰》一二诗可信，他却说：哪里得许多文字证据？我说：无证而可疑的，只当阙之，不可据《序》作证。他又说：只此序便是证。我便说：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所以委曲求合，非要符合《序》者之意，宁可失去诗人之本意而不恤，这真是《序》的大害处。朱熹又举例说，《将仲子》诗只是淫奔，艾轩亦见得。我曾与伯恭论此，如《桑中》等诗，若以为是刺某个人，“则是挾人之阴私而形之于诗，贤人岂宜为此？”伯恭说：“只是直说。”我答道：伯恭如见人有此事，肯作诗直说吗？伯恭平日作诗也不会这样。伯恭说圣人“放郑声”，又却取之，为什么？我说：“放者，放其乐耳；取者，取其诗以为戒。今所谓郑卫乐，乃诗之所载。”伯恭说：“此皆是

^①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四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